

ZHONGGUO ZHUANBIAN
JINGJI FAZHAN FANGSHI
YU GUOJIA NENGLI

**LISHI
XIANSHI JI
ZHANWANG**

段先盛 © 著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与国家能力：

**历史、
现实及展望**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ZHONGGUO ZHUANBIAN
JINGJI FAZHAN FANGSHI
YU GUOJIA NENGLI

LISHI
XIANSHI JI
ZHANWANG

段先盛 © 著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与国家能力： 历史、现实及展望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国家能力：历史、现实及展望 /
段先盛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5141 - 8521 - 8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模式 -
研究 IV. ①F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5635 号

责任编辑：周胜婷

责任校对：隗立娜

责任印制：邱 天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国家能力：历史、现实及展望

段先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9.25 印张 310000 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521 - 8 定价：6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YJA790018）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资助

浙江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前 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中国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题。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1981年，中央正式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的方针。“九五”时期，党和政府针对当时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下、低水平扩张严重的问题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战略思想，强调依靠科教兴国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走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的路子。“十五”时期，中央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效益和结构优化效益，重视资源和环境问题。“十一五”时期，中央更是提出了要把节约能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整体目标。在“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包括培育发展新动力（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新产业体系等。

问题在于，尽管当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已是共识，现实却是久推难转，症结究竟何在？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许多方面论证，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技术和各种硬件条件，如价格机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技术、标准手段，以及制度的完善等，是从经济方面展开的，但如果考虑到“一个事实绝不会完全是或者纯粹是经济

的，总会存在其他的——而且通常是更重要的方面。^①“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我们在解释说明方面的努力，直到我们找到非经济的基地，这对一般理论和对具体事实都是如此。^②”

从经济学的范畴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无疑是属于经济领域中的宏观经济现象，但任何宏观经济现象都有其微观基础，因为“经济制度和行为模式可以解释为很多个人决策的产物或者说是结果。^③”经济发展方式也不例外。经济发展方式是整个经济社会各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方式的综合表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总体上转变社会各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方式。然而，社会系统中的各种经济主体的相互关联性决定了这种变革可能存在着路径依赖，正如加里·D. 利贝卡普所指出的，竞争的利益集团数目越多并且（或者）其异质性越强，分配的冲突就越有可能阻碍或延迟制度的变动^④。因为它至少涉及国家、厂商、党派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诸多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博弈。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及其演变，实质是数量众多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果。此外，任何社会同包括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在内的环境存在交互，这种交互无疑也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及演变。

显然，上述的动态博弈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全社会性特征，本质上要求以国家为中心，通过国家、经济、公众组织、环境四者良性互动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目标，而只有当国家具有克服国内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碍、维持内外平衡、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原因在于，国家相对较有能力依据其目标引导经济社会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如此。为此，本书尝试将政治学中的国家能力研究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中来，以提供一个不囿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观察和思考视角。

围绕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国家能力这一主题，本书以比较的视角，

①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③ H. 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④ 加里·D. 利贝卡普：《产权的缔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从历史、现实、展望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第一、二章属于历史及比较的内容。第一章在界定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家能力内涵的基础上,以中国近代史开端——鸦片战争为起点,通过比较鸦片战争过程中所显现的中国和英国的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方式,阐释了当时中国因为落后而挨打的真正意涵。第二章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能力为主线,比较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1927~1937年、1949~1976年三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1977年以来则以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为切入点,并结合总体性国家能力总结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四、五章则从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创新型经济增长三个专题的角度,研究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及其中的国家能力要求。第三章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变迁,探讨了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工具和供给体系改革的国家能力。第四章在总结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国家制度能力和国家政策能力。第五章研究了创新型经济增长的各种类型,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自由创新的国家规制能力,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创新常态化、法治化的国家能力。

第六、七章属于现实与展望分析。第六章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切入点,基于持续经济增长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从理论层面上分析改善收入分配的国家能力与持续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实证层面探讨中国改善收入分配的国家能力,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第七章围绕中国正在实施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改革、治理战略布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家能力作展望分析。

段先盛

2017年春于中国计量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方式、国家能力之于鸦片战争：落后挨打的历史透视	(1)
第一节 落后挨打的意涵	(1)
第二节 国家能力及其拓展	(5)
第三节 鸦片战争透视之一：国家能力之战	(10)
第四节 鸦片战争透视之二：经济发展方式之战	(24)
第五节 总结和进一步的讨论	(27)
第二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能力：界定、中国的历史考察及比较	(30)
第一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需要强国家能力	(30)
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能力界定	(35)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与国家能力	(40)
第四节 1927 ~ 1937 年的中国国家工业化与国家能力	(59)
第五节 1949 ~ 1976 年的中国国家工业化与国家能力	(71)
第六节 1977 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恢复及提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90)
第七节 总结	(106)
第三章 居民消费及其提升与国家能力	(114)
第一节 居民消费研究综述	(114)
第二节 复杂性科学分析范式下的微观消费及其加总	(118)
第三节 复杂性科学分析范式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思路	(122)
第四节 2000 ~ 2014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变迁及其解析	(124)

第五节	2000 ~ 2014 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及其解析	(133)
第六节	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工具、供给体系改革与国家能力	(159)
第四章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国家能力	(165)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165)
第二节	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家经济制度	(172)
第三节	产业政策与国家能力	(182)
第五章	创新型经济增长与国家能力	(199)
第一节	创新与创新型经济增长	(199)
第二节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205)
第三节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213)
第四节	创新与国家能力	(221)
第五节	启示	(231)
第六章	改善收入分配的国家能力与持续经济增长	(239)
第一节	收入分配恶化、经济增长停滞与“中等收入陷阱”	(240)
第二节	改善收入分配的国家能力：数理分析	(243)
第三节	中国改善收入分配的国家能力与持续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256)
第四节	总结	(266)
第七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家能力展望：改革、治理中的 砥砺前行	(268)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家能力展望	(268)
第二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下的中国国家能力展望	(274)
第三节	全面从严治党下的中国国家能力展望	(279)
第四节	余论	(282)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297)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方式、国家能力 之于鸦片战争：落后 挨打的历史透视

有着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民族无论是在典章制度、经济总量、生产力水平、器物制造、科学技术等方面都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西方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崛起，中华民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不断相对衰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战争形式诠释了当时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落后。有欺凌就有反抗，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一部追求民富国强的不懈奋斗史，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第一节 落后挨打的意涵

1840年，英国为了保护和推动非法的、罪恶的鸦片贸易，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无疑在中国一方，其结果却令人痛心疾首：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文明古国，竟然惨败于国土、人口等都远不如自己的小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对于其中的原因，后人一般以“落后挨打律”来加以诠释。

落后是以某一标准作为参照系对比后的一种认识。就鸦片战争中所反映的中国落后而言，当时国人（也包括当今国人）主要是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作比较而得出的，在当时诸如林则徐、魏源等中国开明之士那里，只限于技术层面。认为中国不仅技术落后，制度也落后，则发生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后，流行于当时“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而认为中国文化也落后进而导致中国国民素质落后，则是迟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民主共和制久久无法构建起来的情形下，在当时曾留学西方和接受西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共识^①。由此看来，前人在探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时，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西方为参照系，二是中国的落后主要包括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在此情形下，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东西。当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俄为师”，然而在实践中照搬照抄却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历史是割不断的，原因在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不懈奋斗历史也表明：一方面，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革命是如此，中国的建设也是如此，否则，我们容易掉入西方普世主义的泥坑^③。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过度苛求前人，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对复杂得多的社会的认识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面对如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防止误入肯定中国一切同时否定外国一切的民粹主义，以及对于来自国外的过分美化中国的思潮，

① 在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③ 一个事实是，“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挑战。”转引自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掉以轻心^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就身临其境的我们而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

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的技术落后于英国，人们并无多大异议，因为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可以进行客观评判^②，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则不然，争议很大，这种争议可以归结为制度和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缺少一致同意的客观标准。实际上，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为例，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并不一样，因为“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③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思想文化也是如此，否则，我们无法理解20世纪初在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的论述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④，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却又运用儒家文化价值体系来解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这种学术悖论现象。无独有偶，曾赞美“华盛顿共识”并作出“历史终结”预言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也转而强调政府部门、社会安全网和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见一斑。这种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落后判断标准上的争议和悖论现象，意味着继续深入探究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反映的中国落后有其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就体现在落后的客观判断必须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⑥。首先，

①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以及美英等国对我国香港地区政治的粗暴干涉，充分说明压华、侵华之心不死。

② 在卡尔·波普尔看来，“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以及“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参见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7页、21页。

③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91页。

④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⑤ Birdsall, N. and Fukuyama, F.,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11, pp. 45-54.

⑥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认为“西方模式”无可替代，只可被模仿，也应被模仿。而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参见萨米尔·阿明：《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起源与历程》，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制度和文化的社会演进的结果^②，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看，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出现并存在一段时期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其次，把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抽象出来加以比较，本身就缺乏普遍联系的思维，本质上属于一种机械还原论思维，将发达国家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没有估计到被移植的制度如何植根于现实社会，如何与现实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兼容，从而容易产生水土不服问题，即存在阿夫纳·格雷夫所总结的诸如环境效应、协调效应、包容效应和边际效应等问题^④；再其次，必须唯物辩证地对待本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态度，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态度；最后，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比较，只能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是否推动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使社会实现民富国强，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作为评判标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家^⑤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就中国而言，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⑥就英国而言，1485年都铎王朝的确立才意味着英国开始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雏形，而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已发展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现代国家，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比较研究中英鸦片战争的国力，既符合历史事实，也易于明晰历史事实。

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本质就是国力的较量，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在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那里，“自然淘汰”“适应过程”已被用来描绘人类社会结构和制度演进。参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④ 参见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⑤ 这里的国家概念是一个政治机构性组织概念，其功能包括立法，治安，司法行政，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福利行政，军事行政等。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⑥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可以简洁地归纳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就人的因素而言，不只是符合服兵役条件的劳动力数量及素质和符合军事生产条件的劳动力数量及素质，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军事人力的调配和运用，前者可以归结到是国家与公众组织互动能力在战争中的体现，后者则可以归结到国家内部互动能力在战争中的体现。同时，国家对军事人力的调配和运用还必须建立在对战争中的敌国情形的了解和掌握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映的是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能力。

而就战争中的物的因素而言，既包括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数量和质量，也包括战争的后勤供给，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民富国强程度。一个社会实现民富国强的具体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最终都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方式，即社会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方面，可以通过生产结构（包括微观层面的投入结构和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加以衡量。而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技术落后，其本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

第二节 国家能力及其拓展

上述的国家与公众组织互动能力、国家内部互动能力、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能力的有机综合，本书以总体性国家能力称之，可视为政治学中所定义的国家能力——国家塑造和执行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战略的能力的一种拓展。

一、国家能力研究回顾

国家能力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占主导时期，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总体绩效，其行为包括提取、规制、分配、符号和响应^①；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斯科波（Skocpol）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学派，将国家能力定义为是国家通过政策实施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并划分为总体性国家能力

^① Almond, Gabriel A. and Powell, G. Bingham.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和政策性国家能力两种类型，认为国家能力是个相对概念，要放在一个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视角下分析^①；1988年，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米格德尔（Migdal）提出，国家能力应是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或者说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并基于支配和社会控制的角度，将国家能力归纳为提取、渗透、规制、分配四种能力，国家能力被看作是国家社会之间的零和博弈结果，社会由此纳入了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②；20世纪90年代，帕特南（Putnam）等人认为强大的社会资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社会强大起来并提高政府效能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强社会、强经济、强国家的三强组合^③。据此，在埃文斯（Evans）看来，一个自主性强的国家机构能够和商业集团形成嵌入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关系，进而促进产业的升级，这意味着国家社会能够形成一种协同关系，使得双方都得到发展^④。即，强大的国家能力体现在国家自主性能力和国家嵌入性能力能相辅相成。而国家的自主性取决于国家专制性权力强弱，国家的嵌入性则取决于国家建制性权力强弱^⑤。

二、国家能力拓展

以上简述的国家能力研究历程表明，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已成为国家能力研究的核心。只不过在已有的研究中，这种互动局限于国家—公众组织关系视角，而这一视角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缺乏开放性的系统视角。就国与国之间战争而言，其本质就是一国与作为国际社会的他国之间的战争，因此需要将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能力纳入国家能力范畴。此外，就19世纪40

① Skocpol, Theda.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Evans, Peter B. Rueschemeyer, Dietrich. and Skocpol, Theda.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Migdal, Joe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Putnam, Robert D., Leonardi, Robert. and Nanetti, Raffaella.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④ Evans, Peter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 2.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年代的中英两国本身而言，无论是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皇权专制下中国官僚体制，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英国官僚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都存在着运行效率问题，可以称之为国家内部的互动能力问题，即，还需要将国家内部的互动能力纳入国家能力范畴。综合起来，国家能力可以通过国家与公众组织的互动能力、国家内部互动能力，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能力加以表征。

以上三种能力的行为主体及联系场合可以通过图 1.1 加以考察、分析。其中，双向箭头表示国家、公众组织、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这里的公众组织是指与国家（社会的一部分）相对应的由其他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既包括社会中的个人、家庭、群体，也包括具有组织性质的公众组织（诸如企业、社团、协会、党派团体、利益集团等）。而之所以没有采用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主要考虑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中市民这一概念具有都市化^①含义，应用于农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中国无法满足其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没有使用民间社会这一概念，则是因为如邓正来先生所指出的，民间社会“带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而忽视了“在可欲可行的基础上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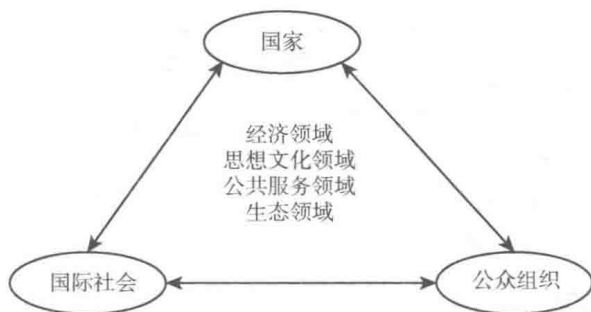


图 1.1 国家·公众组织·国际社会三元互动

实际上，国家、公众组织、国际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的内部互

① 关于近代市民观念的三种含义及其考证，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②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 5 月，总第 15 期。

动组成了一个社会有机运行图，而社会是否实现了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则关乎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而当上述三元内部或三元之间表现出非良性互动时，社会则可能出现冲突甚至动荡。而国家与公众组织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及程度如何，国家内部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及程度如何，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及程度如何，则从宏观整体上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强弱，可以从经济、思想文化、公共服务、生态四个领域加以考察和分析。

国家与公众组织在经济领域的互动能力，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加以界定和衡量：第一，公众组织从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与否及其程度；第二，国家汲取经济资源得到公众组织支持与否及其程度；第三，国家监管经济秩序得到公众组织支持与否及其程度等方面来加以界定和衡量。显然，如果国家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经济控制等掠夺公众组织的经济行为主体，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从而导致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性激励不足甚至反抗，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经济互动能力是低下的。反之，如果国家支持和保护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由进入和竞争，使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经济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可以获得生产产品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从而导致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经济互动能力是强大的。

国家与公众组织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互动能力，可以通过在思想文化的生产、流通、传播、接受过程中，国家与公众组织存在互动与否及其程度加以界定和衡量。显然，如果国家层面与公众组织层面的思想文化不能相互融合，并起到引领作用，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思想文化互动能力是低下的。相反，如果国家能够培育和巩固国家和公众组织共同认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思想文化互动能力是强大的。

国家与公众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互动能力，可以通过在提供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权利、教育权利、医疗保健保障权利、生活困难救济、临时灾难救济等公共服务权利过程中，国家与公众组织存在互动与否及其程度来加以界定和衡量。显然，如果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军队或警察具有私人性特征，公众的社会保障得不到保证，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公共服务互动能力是低下的。反之，如果军队或警察具有公共性特征，公众的社会保障得到保证，则可以认为国家与公众组织的公共服务互动能